

教子有方母有功

□ 石志刚

在中国历史上，不乏英豪男儿，亦不乏识见有方的女性。她们能够在家庭中扮演重要角色，尤其是在培养孩子孩子方面，起到了非常关键和重要的作用，为自己孩子成长成功提供了优质的教育和成才理念。

成长走正道

个体在家庭中受到什么样的指导和教育，从某种程度上来讲，决定了其在未来的作为和成就。个体在早期心智逐渐走向成熟的阶段，定会遇到各种纷扰，如果对这些纷扰出现判断偏差，就会走向歧途，家庭中的长辈没有及时指出、进行矫正，人生方向可能就会偏失。魏晋时期著名学者、医学家皇甫谧之所以能够取得那么大的成就，原因在于少年时期得到婶母悉心的教诲。皇甫谧幼年时期，父母双亡，他寄养在叔父家中。婶母对他如对待自己亲生的儿子，他侍奉婶母也有如生母。皇甫谧在年少之时，没有养成好的学习习惯，《晋书》记载他“年二十，不好学，游荡无度，或以为痴”。他的婶母开导他：“汝今年余二十，目不存孝，心不入道，无以慰我。”意思是说，你今年都20岁了，还未知书达理，没有可以用来宽慰我的任何表现。婶母在说这番话的时候，“因对之流涕”，使得皇甫谧深受感动。皇甫谧立即拜乡里名学者为师，用功学习，“勤力不怠”，不仅培养出高尚的情操，还著书立说，传教于人，其所培养的门人摯虞等人，皆为晋代名臣。

为官要清廉

中国古代社会出现许多品行高

尚、为官清廉的历史人物，他们在推动历史发展、改善社会政治生态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。他们能够做到为官清廉，也是众多原因促成的，其中有一点重要原因就在于他们的家教文化十分深厚。唐代名臣崔玄暉为官有良好声誉，其母卢氏的深切教导发挥了重要作用。家中有亲戚对卢氏说：“儿子从宦者，有人来云贫乏不能存，此是好消息。若问费货充足，衣马轻肥，此恶消息。”这句话意思是说，儿子做官，有人来讲他在外面贫穷得不能生存下去，这是好消息。如果听说他财货充足、轻装肥马，这是坏消息。卢氏觉得亲戚说的这段话非常有道理，“以为确论”。卢氏遂将之转告崔玄暉，接着对他说：我看到亲戚中有当大官的人，大都用钱物孝敬他们的父母，而那些做父母的见钱眼开，竟然不问他们的儿子这些钱财的来源，如果确实是从俸禄中节余下来的，那倒也是好事；如果是他们当官的儿子通过不正当的手段得来的，这与盗贼又有什么区别呢？卢氏接着对崔玄暉进行诫勉：“汝今坐食禄俸，荣幸已多，若其不能忠清，何以戴天履地？”已经被朝廷宠幸，享有俸禄，应该是荣幸之至，若你不能做到清正廉洁，何以堂堂正正做人？卢氏最后对崔玄暉提出希望：“特宜修身洁己，勿累吾此意也。”你一定要修身洁己，不要辜负了我这番心意。《旧唐书》记载，在听了母亲的告诫后，崔玄暉“遵奉母氏教诫，以清谨见称”。

做事要公正

作为官员，手中掌握权力，本来的为百姓服务的，但是如果在做事行权的过程中，有些许不公正，

就会扭曲权力，使权力变质变味。隋末唐初名臣郑善果的母亲崔氏素有贤明之名，教子有方。郑善果的父亲在征战过程中殉国，郑善果在很小的时候就继承了父亲的爵位，后来又成为主政一方的地方长官。为官节俭、办事公正是崔氏对郑善果谆谆教诲的核心内容。崔氏坚持每天纺纱织布，到很晚才能休息。孝顺的郑善果对其母劝说道：“儿封侯开国，位居三品，秩俸幸足，母何自勤如是邪？”崔氏听了之后，对郑善果进行教诲：你的年龄已经不小了，原以为你已经懂得天下的道理，现在听到你说这些话，才知道你并没有懂。我真怀疑，照你这样，你靠什么来处理好公事呢？你的职位俸禄都是皇帝对你父亲以身殉职的报答，你应当将这个恩惠散开用来以赡养亲属，我怎能独享其利呢？纺纱织布本来就是妇女之事，如果不做这些事情，那就会骄奢淫逸。我虽然不知道礼数，难道可以败坏自己的名分吗？郑善果听了以后，深受教育，从此以后，为官办事更加认真。郑善果处理政务时，崔氏总是在里屋细心聆听，如果郑善果办事公正，剖析合理，她就会很高兴；如果郑善果办事不公正，剖析不合理，她就会不高兴。崔氏一不高兴就不与郑善果说话。孝顺的郑善果“伏于床前，终日不敢食”。这时，崔氏才对郑善果进行教诲：你这样办事不公正，“内则坠尔家风，或亡官爵；外则亏天子之法，以取罪戾”。听了这段话后，郑善果在为官过程中更加注重办事公平公正，“所在有政绩，百姓怀之”。

要忠诚爱国

爱国是积淀于国人血液中的文

化因子。贾谊说：“国而忘家，公而忘私，利不苟就，害不苟去。”晋朝名将虞潭的母亲孙氏非常注重对孩子的家庭教育。孙氏出身名门，识见高远。《晋书》记载孙氏结婚后：“恭顺贞和，甚有妇德。”等到其夫去世，孙氏“躬自抚养”虞潭。孙氏高远的识见在帮助虞潭成长的过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。“性聪敏，识鉴过人”的孙氏在抚养教育虞潭过程中，让虞潭从思想认识层面树立爱国理念，强调要对国家忠诚，“潭始自幼童，便训以忠义”。虞潭成年后成为一代名将，在平叛叛乱、维护国家统一方面贡献颇多。孙氏教导虞潭忠诚爱国这一行为在其中发挥了关键作用。时任南康太守的虞潭，遇到杜弢组织流民谋反，“孙氏勉潭以必死之义，俱倾其资产以馈战士”，孙氏对虞潭的鼓励、支持坚定虞潭平叛决心与信心，结果就是“潭遂克捷”。后来苏峻作乱，虞潭响应陶侃，平叛苏峻之乱。此时，孙氏对虞潭寄予厚望，提出全力以赴要求：“吾闻忠臣出孝子之门，汝当舍生取义，勿以吾老为累也。”孙氏还将自己珍藏的首饰当卖以为军资，还将自己的家僮派到虞潭身边助战。当孙氏听说会稽内史王舒派子参战这个消息后，建言虞潭：“王府君遣儿征，汝何独不？”虞潭于是派子参战。《晋书》评价孙氏：“其忧国之诚如此。”孙氏教导有方，终使虞潭成为一代名将，同时，赢得了广泛的社会赞誉。《晋书》记载孙氏“拜武昌侯太夫人，加金章紫绶”，当孙氏去世的时候，晋成帝“遣使吊祭”，“谥曰定夫人”。

人物志

明代何良俊所著《四友斋丛说》记载，“白袍点墨，终不可渝”。意思是说一袭白袍若是着了黑墨，就永远也洗不掉了。比喻做人做官要非常清正廉洁，不可如“白袍点墨”。“白袍点墨”的故事讲的是：明代有一个叫山云的将军，被朝廷委派到广西做总兵，他听说广西那时候送礼受贿的风气非常兴盛，于是就问一个叫郑牢的老吏自己是不是该入乡随俗。郑牢就跟他说，你到广西做官犹如“一袭白袍”，千万不能入乡随俗，要不然“白袍点墨”，永远洗不干净。山云觉得很有道理，就又问，如果不收礼当地人不高兴怎么办？郑牢说，朝廷严罚贪官，要杀头你不怕，反倒怕这些人不高兴？山云觉得这话非常有道理，于是坚持自守自律，洁身自好，在广西做了十年清官，廉洁操守始终没变。

“白袍点墨”这个故事告诉人们，做人做官关键是要自己坚守道德准则，不能受到外界的影响和干预，特别是在社会风气不正的情况下，依然需要自己明辨是非，不能受别人的影响，不能怕得罪人，要对自己负责，对天下负责。

“白袍点墨”这个故事说明，清正廉洁是当好领导干部的底线，只有自己严守清廉，才能敢于坚持原则，新任领导干部等都如“一袭白袍”，要防止“白袍点墨”终不可洗守。领导干部要善于拒绝各种诱惑，讲品德、讲原则、讲底线，如果坚守不牢，防线就容易被打开口，洁白的衣服就容易被染色，就有了污点，而有了第一次，便会有第二次、第三次，就如同决堤的洪水一泻千里、一发不可收拾，最终往往就会导致全线崩溃。

“白袍点墨”的廉政启示对于现代社会非常重要。这是一个充满诱惑的时代，每一个诱惑都会让人防不胜防，很容易被染墨。许多领导干部正是在不知不觉，放松了警惕，被诱惑上钩，被金钱俘虏。有的甚至已经行将退休，却被拖下水。所谓“一日得失看黄昏，一生成败看晚节”，到了晚年更要洁身自好，切不可为一时一己之私利而“一失足成千古恨”，点墨沾身一辈子都洗不干净，只会留下深深的遗憾。所以陆游曾有诗写到：“愈老愈知生有涯，此时一念不容差”。说的就是这个意思。

共产党人以清正廉洁起家，早在1936年，美国记者斯诺访问延安时，

故事中的廉政之道

□ 沈小勇

就被毛泽东、朱德等共产党领袖们的廉洁节俭所深深感动，他甚至断言这种廉洁节俭的作风会产生一种伟大力量——“东方魔力”。1949年美国大使司徒雷登对国民党的军官们说：“共产党战胜你们的不是飞机大炮，而是廉洁，是靠廉洁换得的民心。”

俗话说：“物必自腐，而后虫生。”腐败的诱发关键还是内因起作用。廉洁自守就像是一种抗原，但是食欲的闸门一旦打开，就会如滔天洪水，一发不可收拾，所以关键还是要从自身做起，特别是要管好下属、子女和身边的工作人员，为各种诱惑关上大门，既要防止自己变节，也绝不能因为家属和身边工作人员而为他们充当保护伞，落下“白袍点墨”的悲剧。古人云：“莫以善小而不为，莫以恶小而为之。”细节虽小，但是却见风骨。善虽小，却乐意为之；恶虽小，却坚决不为。小事、小节中体现了政治，体现了形象，更关乎我们的人格。因此，要坚守底线，防微杜渐，慎微、慎初、慎独。

及陈涉起兵，张良也集聚人马反秦，本想投奔景驹的，半路上遇到了刘邦。此时刘邦还只是让张良给他当管马的官。

这说明刘邦量才为用的用人观，是结合实际灵活运用的。面对萧何、曹参、周勃等知根知底的人，可以及时根据其才能与功绩而任用。但在面对如张良、陈平、韩信等半路加盟的人才，则有一个根据实践检验再擢用的过程。在某人没有显出大才之前，刘邦是不会把他放到高位的，但又不会轻易让人才流失，颇有点为自己储备人才的意思。要得高位，还得靠人才用真本事去获取。

估计那些自负高才的人，一般都忍受不了管马这样的职务，孙悟空就忍受不了“弼马温”这样的官职。但张良能忍受，他就是在管马的期间，给刘邦讲《太公兵法》。没想到刘邦听了很高兴，还“常用其策”。事实上张良还对别人讲过，别人听来都觉得不知所云。因此张良感慨“沛公殆天授”，因此就跟定刘邦，不去找景驹了。

此后，每每在关键时候，张良都献计，刘邦都用其计。在刘邦想用两万人强攻秦军时，张良劝他派人去贿赂秦将，又趁其不备而发起突然进攻。刘邦就这样进入咸阳。进了秦宫，刘邦沉迷于声色犬马而不想走，樊哙劝他住到外面去也不听。张良一劝，便“还军霸上”。可见此时张良在刘邦心中的位置已十分重要了。

及至项羽设鸿门宴，又是张良用计使刘邦逃出生天。后来，刘邦被项羽打败西逃下邳时，提出了一个著名的命题：如果我豁出去，把函谷关以东的地盘都分给他们，谁可以帮我一道破楚立功？可以说，这正是刘邦事业的低谷期，也是转折点。转折就起于张良之计。张良分析一番情势，推荐了三个重要人物：黥布、彭越，以及刘邦部下韩信，言“独韩信可属大事，当一面”。如果真想把地盘拿出来，那就分给他们三个，“则楚可破也”。事后正如张良所料，司马迁亦称“卒破楚者，此三人力也”。类似这种你死我活的争雄年代，智谋之士的力

量，一点也不逊于文臣与武将。他们往往能于险峻处化险为夷、在穷途时绝处逢生。

雄主的判断力

而在项羽把刘邦围困于荥阳的危急时刻，刘邦即和酈食其商量如何削弱项羽的势力。酈食其便建议刘邦把六国的后代再封立起来，刘邦的德义就会风行天下，因而就会成为霸主，项羽就会俯首称臣了。刘邦还真就准备立即这么干。这显然是不切实际的书生之论，也说明刘邦当时“有病乱投医”，更表明刘邦所问非正确之人。

幸好这时张良从外面回来，而酈食其还没有出发，刘邦看见张良便说了此事。这可谓机缘巧合，也表明刘邦可能心里不踏实，多听别人意见总是好事。不意张良一听就说，这样做就要完了！于是张良一边详细分析一边说了八个不行，“其不可八矣”，结论就是，把六国立起来，他们就会立刻屈服于项羽，“陛下焉得而臣之？”可谓鞭辟入里，句句在理。这一故事表明，张良为汉代第一谋臣，当之无愧。

关键时刻的谋略，可谓事关生死存亡。张良每每都能出正确的奇谋大智，而刘邦都能用，刘邦的知人不可谓不深，信任不可谓不重，其判断力亦不可谓不明。尤其是那些不能立时见效却关系长远的谋略，最考验雄主的判断力。很多人觉得，雄主用谋臣的谋略实现了目标，那是谋臣的能耐，不能说明雄主的能力。但问题是，君主身边往往不缺少各种意见、建议、谋略，而且从各自角度出发都很有道理，那么如何判断、取舍、听取？历史表明，非雄主往往难有正确的选择。比如春秋战国时期，楚怀王就不听屈原、陈轸之言，而信了张仪的所谓谋略，终为张仪所欺而客死异乡，即为明证。

设若刘邦真用了酈食其之言，又如何能成其大业？所以雄主与谋臣，往往是一种共生关系，缺一不可，更往往能心有灵犀一点通，这也是为什么张良跟定刘邦的原因。

选人用人史话

雄主与良才的互动

——刘邦用人史话（中）

□ 陈家兴



忠诚之人当朝

自古人臣有“功高震主”之说，人君则有“后顾之忧”之心。刘邦与萧何也不例外。即便两人相互高度信任，也难免有一时的疑忌，但两人自始至终能成就君相相宜的千古佳话，就在于双方都能及时解疑去忧。

当初，刘邦与项羽长期相持不下时，刘邦一连几次派人回关中慰问萧何。萧何的心腹便提示说，这是汉王“有疑君心也”，于是建议萧何把子孙兄弟凡是能拿起武器的全都送到前方。刘邦果然很高兴。后来，代相陈豨造反，刘邦在平叛途中，又闻吕后用萧何计杀了阴谋造反的韩信时，便派人到长安拜萧何为相国，又增食邑五千户，派五百人给萧何做警卫。大家都来贺喜，唯独其门客召平来警告说，皇上“有疑君心矣”，“愿君让封勿受，悉以家私财佐军，则上心悦”。结果“高帝乃大喜”。

由此看来，萧何也是一个会琢磨事不会琢磨人的老实人。其琢磨事，能把一应治理之事，收拾得无所不当。其琢磨人，却稍逊风骚，因此需要宾客心腹的提醒。琢磨事之极致者，往往迂腐；琢磨人之极致者，则多为奸佞。天下二者不少，居于二者之中者更不知凡几。综观历史，大凡政治清明之世，琢磨事者多，琢磨人

者少，而国运日隆。相反，则琢磨事者靠边，琢磨人者入位，而国运日衰。

萧何与曹参当初做小吏时，是好朋友，后来为将为相，反而关系不好。等到萧何病重时，孝惠帝探问：“君即百岁后，谁可代君者？”萧何说：“知臣莫如主”，孝惠帝问曹参如何，萧何说：“帝得之矣！臣死不恨矣！”由此观之，萧何不以私仇而弃公义，用人上亦可谓举贤不避仇。萧何，真可谓千古贤相、百世流芳。

刘邦与曹参，可以说也是“过命的交情”。曹参跟随刘邦一道出生入死，功勋卓著。刘邦之用曹参，遵循的仍是论功行赏、火线用人的策略，每一立功，必授官。《史记》记载曹参的故事，大体是曹参跟随刘邦一路征战、刘邦则一路封曹参官职与赐食邑的轨迹。“赐爵七大夫”“迁为五大夫”“封参为执帛”“迁为威公”“迁为执珪”“封参为建成侯”“迁为将军”“赐食邑于宁秦”等。曹参的故事相对简略，但其功勋卓著、一路升迁的事迹，足见刘邦用人之道甚明。

周勃的故事同样比较简略，《史记》记载周勃的事迹，一连用了18个“攻”字，“攻丰”“攻碭”“攻蒙、虞”“攻开封”……传神地刻画出周勃敢为先锋征战沙场的无畏精神，刘邦也是根据他的功绩而不断予以擢用。周勃属于“鄙朴人也，才能不过凡

庸”之人，但刘邦认为“可属大事”。这说明刘邦用人的眼光的确超凡。事实上，刘邦起事后，周勃就一直跟在他身边冲锋陷阵、浴血奋战，因此而立下赫赫战功。

对于曹参、周勃一类的人才而言，功名是激发其潜能与斗志的动力。有功必被赏以相应的官位与名利，则往往敢死战，敢攻坚。刘邦对于这类在一线冲锋陷阵、攻城拔寨的将士，深谙激励之道。

张良择刘邦而栖

如果说文臣之萧何与武将之曹参、周勃，都是和刘邦从小玩到大、知根知底的人，那么张良则没有这样的“先天基础”，他跟随刘邦纯粹是为了心中的理想抱负，起初即所谓“子房本为韩仇出”。

张良是刘邦的重要谋臣，《史记》载张良体弱多病，没有领兵独当一面，“常为画策臣，时时从汉王”。在楚汉争锋的战争时期，智谋乃是决胜千里的关键因素。可以说，张良和萧何一样，乃是刘邦的左膀右臂。

张良原是韩国人，自韩被秦灭后，张良还在博浪沙袭击过秦始皇以报韩仇。后来，机缘巧合，得了黄石公《太公兵法》，便习诵于心，完成了从一个勇士向谋士的人生角色转变。